

言文

语言文字学的

新探索

周有光 著



语文出版社

言文

语言文字学的

新探索

周有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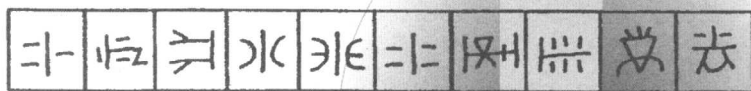
商务印书馆出版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YUYAN-WENZIXUE DE XIN TANSUO

语言文字学的新探索

周有光 著



语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文字学的新探索/周有光编著. —北京:语文出版社, 2006. 9

ISBN 7-80184-821-7/H·71

I. 语… II. 周… III. 汉语—语言学—高等学校—课外读物 IV. H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2970 号

语言文字学的新探索

周有光 著

*

语文出版社出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E-mail: ywp@ywcb.com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印刷

*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201 千字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20.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编选说明

本书是大学“现代汉语”和“现代汉字学”等课程的补充读物，选收周有光先生的文章二十六篇，分为五组。第一组开启语文的宏观理解。第二组指引语文的基本规律。第三组说明“汉语拼音方案”和“汉语拼音正词法”。第四组阐述“现代汉字学”。第五组纵览世界的文字。文笔简明，说理平易，扩大视野，启发思考。

周有光和语言文字学（代序）

周有光（1906~ ），原名耀平。1923 年就学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25 年因五卅惨案离校，改读爱国师生创办的光华大学，1927 年毕业。1927 年至 1949 年，任教于光华大学、江苏教育学院、浙江教育学院，任职于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并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1949 年上海解放前夜回国，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政经济学院。1955 年以后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和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周有光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就十分爱好语言学，曾参加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尤其是对语文现代化工作特别有兴趣，著有《汉字改革概论》《中国语文的现代化》《世界文字发展史》等二十余种专著及论文三百余篇。

周有光的语文现代化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

中国的语文现代化运动，开始于清末。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三项当前任务：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1955 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后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周有光是委员之一。他提出普及普通话的两项标准：1. 全国汉族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2. 全国公共活动以普通话为交际媒介。

1955 年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下面设立拼音方案委员会，推叶籁士、陆志伟、周有光起草《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在研究了方案的原则和技术问题，包括字母形式、语音标准、音节拼写法、字母的具体安排等问题之后，拟出最初的方案草案。

周有光提出汉语拼音方案三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又进一步说明：它不是拼写汉字的方案，而是拼写汉语的方案；不是拼写文言的方案，而是拼写白话的方案；不是拼写方言的方案，而是拼写普通话的方案。方案经过三年的反复推敲方才完成。1958 年经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通过公布。1979年至1982年，周有光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经过多次会议，由投票通过《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

《汉语拼音方案》是以音节为单位的拼写法规则。方案公布之后，周有光进一步研究以词语为单位的拼音正词法，形成《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1988年公布。他从50年代开始主编《汉语拼音词汇》，经过两次修订再版。1989年又出版重编本，正文以语词为单位，不列不成词的条目，采用纯字母排列法，不用拼音和汉字的多重排列法，使同音词都排列在一起，成为电脑的中文词库基础。

二、研究中国语文的现代化问题

1958年秋季，北京大学中文系邀请周有光开讲“汉字改革”课程。事后出版讲稿《汉字改革概论》，1961年第一版，1964年再版，1979年第三版，1978年出香港版，1985年在日本出日文翻译版。这个课程，前后在北京大学开讲三次，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讲两次。讲稿尝试把文字改革从感性知识提高为理性知识，使群众运动跟语言学挂钩。

文字改革对语言学和文字学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例如：共同语的语音标准和词汇规范化问题；词与非词的界限问题；词的结构问题；字和词的频度问题；汉字的定形、定量、定音和定序问题；同音字和同音词问题；简化和繁化问题；声旁的有效表音功能问题；汉语和汉字的内在规律问题等。新问题扩大了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范围。

关于同音词问题。周有光提出，同音词是语言问题，不是文字问题。在文字上分化同音词，汉字可以做到，拼音也可以做到，但是这只能使“同音词”变为“异形词”，不能使“同音词”变为“异音词”。分化同音词必须分化读音或改变词汇。50年代把“炎症”和“癌症”的读音分化，把“初版”改为“第一版”，跟“出版”相区别，这是成功的例子。

关于形声字的表音功能问题。周有光算出现代汉字(七千字)中“声旁的有效表音率”为百分之三十九；如果区分声调，不到百分之二十。古人造字，只求声旁读音近似，不求读音准确。读音的历史演变，又使声旁大都失去了表音功能。

周有光计算，在七千个现代汉字中，有基本声旁五百四十五个(不同字典数目略异)，其他是滋生声旁。能独立成词的“词字”占三分之一，不能独立成词的“词素字”占三分之二。单音节词(词字)的数量有相

对稳定性。多音节词（其中包括词素字）的数量能无限增加。

在比较多种现代汉字的使用频率之后，周有光发现“汉字效用递减率”：最高频一千字的覆盖率大约是百分之九十，每增加一千四百字只提高覆盖率大约十分之一。多种字频统计证明这个规律基本上接近实际，可以用来作为减少字量的理论依据。

传统汉字学研究汉字的形音义的历史演变，实际是“历史汉字学”。为了当前应用的需要，周有光提出要从历史汉字学中分出一个分支，叫做“现代汉字学”，研究现代汉字的现状和应用问题。他发表论文《现代汉字学发凡》。

汉字简化从 1956 年的《汉字简化方案》（五百一十五字）类推成为 1964 年的《简化字总表》（二千二百三十五字）。在七千个通用汉字中，三分之一是简化字，三分之二是没有改动的传承字。根据小学教师的经验，简化的好处是“好教、好认、好写”。简化字的清晰性在电视上极为明显。

简化是不是所有文字的一般发展规律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人说，汉字既有简化，又有繁化，形声字不断增加就是繁化。周有光认为，“形声化”是符号的“复合”，不是“繁化”。产生“繁化”感觉，是因为把几个符号叠合成一个方块。如果线性排列，就不会发生繁化的感觉。例如，丁头字和圣书字中的形声字，把多个符号线性排列，没有发生繁化的感觉。汉字中除形声复合之外，独体字很少发生繁化；而形声字中的部首在楷体中也都发生了简化。

三、研究比较文字学和文字的发展规律

为了科学地了解汉字的性质，周有光研究了比较文字学和文字的发展规律。

有人认为文字的特点是由语言的特点决定的。汉语有音节分明的特点，适合用表意的汉字；英语有词尾变化的特点，适合用表音的字母。这个说法近来很流行，对不对呢，周有光作了如下的比较。

汉语和藏语同属汉藏语系，藏语也是音节分明而没有词尾变化的，可是藏文不用汉字而用字母。可见语言特点不能决定文字特点。

用汉字的除中国以外还有日本、朝鲜、韩国和越南等。日语不属汉藏语系，有词尾变化，跟汉语大不相同，可是日本用汉字。朝鲜语（韩

语)属于阿尔泰语系,也有词尾,跟汉语大不相同,可是朝鲜用汉字。越南语(京语)跟汉语非常相似,原来用汉字,后来废除汉字改用字母。这三种语言,不同于汉语的采用汉字,相似于汉语的采用字母,正好否定“语言特点决定文字特点”的说法。

正确的理解是:文字的特点决定于文化(包括宗教)的传播,不决定于语言的特点。

一般认为,“从表形到表意到表音”是文字的发展规律。有人说:汉字用了三千年,没有变成拼音文字,可见“形意音”的发展规律不能成立。周有光从比较文字学得到了解:丁头字在两河流域,从苏美尔传到阿卡德、巴比伦和亚述,只增加表音的音符,不废除表意的意符,但是传到本土以外的民族,就摆脱“意音”结构,变成表音文字。“形意音”的发展是在从本土到异地的传播中实现的。汉字也有同样情况。在中国,形声字历代增加,但是声旁增加,形旁也跟着增加,没有改变“意音”的结构。但是汉字传到日本,从万叶假名变为平假名和片假名,发生“形意音”的变化,这也在传播到本土以外才发生的突变。

后来,周有光又发现,文字在本民族中的传播,会在自身内部发生“形意音”的变化。例如:彝文的两种规范化文字中发生“形意音”的演变,云南规范彝文是“意音”制度,四川规范彝文是“音节”制度。又如:在纳西族的“东巴文”中,正在发生从“形意”到“表音”的演变;东巴文内同一个句子有两种表达法,一种是表形兼表意的“章节图符”,另一种是表音的“音节字母”。(详见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中的“彝文演变的特点”和“东巴文中章节图符和音节字母的对照”)由此得到结论:“形意音”是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

“六书”是否是汉字所独有的问题。周有光把“六书”分为“形意音”三个层次:1. 象形是表形,2. 会意是表意,3. 假借是表音。指事也是表意,转注是形意变化,形声是表音兼表意。国外学者指出,“六书”可以说明跟汉字同类型的其他古典文字的造字和用字原理。周有光进一步详细说明这一原理,他比较五种古典文字(汉字、丁头字、圣书字、马亚字、云南彝文),发表了《六书有普遍适用性》。

他在比较中外学者相互不同的文字分类法之后,提出“文字三相分类法”(符形、语段、表达法),建议以客观条件统一各家的分类法。在“三相分类法”中,任何文字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对少数民族的语言进行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得到多种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字。周有光发表《汉字型文字的综合观察》,把多种汉字型文字看做一个系统,提倡研究“广义汉字学”。

他把汉字的传播历史分为四个阶段:1.学习阶段,大家学习汉语汉字;2.借用阶段,借用汉字书写当地语言;3.仿造阶段,模仿汉字造成非汉语的民族新汉字,包括孳乳仿造和变异仿造;4.创造阶段,简化汉字或其笔画,成为音节字母或音素字母。他认为,这个“四阶段传播规律”也适用于丁头字和其他文字系统。

四、研究中文的信息处理和无编码输入法

信息化时代,在电脑上如何输入汉字成为日本和中国共同遇到的瓶颈问题。两国同样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整字输入法,2.拆字编码输入法,3.无编码的拼音(假名)变换输入法。整字输入法最早在日本实行,不久就放弃了。编码输入法在日本尝试了一个短时期,就改为无编码的假名变换输入法。中国长期满足于笔画和部件的编码输入法,新的编码设计越来越多,超过了一千种,形成“万码奔腾”的局面。

周有光在50年代也设计过一种“音节、声调、部首”编码,可是不久就转向研究无编码的“从拼音到汉字”的自动变换法,他发表《利用汉语的内在规律,改进中文的输入技术》,认为汉语的内在规律,例如语词规律、词频规律、语境规律、声韵互补规律,等等,可以作为中文电脑智能化的依据。汉字也有内在规律,但是复杂而多例外。所以字形编码都是“多重”规则,而每重规则又都有例外,使用不便。这是普及中文电脑、使中文进入国际互联网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战后新兴国家都遇到如何引进科技术语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用字母的国家无例外地原样借入,实行“术语国际化”。日本原来跟中国一样,采用“意译、单音节化、造新汉字”的翻译方法,后来改为利用片假名直接音译外来术语。中国现在的方法是“意译为主、音译为辅”。意译的好处是容易为群众所理解,缺点是“一名之定,十年难期”,在时间上难于追赶先进,也不利于阅读国外科技文献。周有光提出,解决方法是“术语双语言”:对一般群众用意译,限于常用术语;对专业工作者实行术语国际化,利用汉语拼音,方便追赶科技的迅猛发展。他发表《文化传播和术语翻译》,说明“术语双语言”的重要性。

周有光提倡“两个双语言”政策：一个是方言和共同语的国内双语言，另一个是汉语和英语的国际双语言。他发表《双语言时代》，说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急需实行两个双语言。

（摘自《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2004年版）

目 录

语言生活的历史进程·····	(1)
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	(9)
文字的演变性和稳定性·····	(14)
汉字的技术性和艺术性·····	(17)
文字发展规律的新探索·····	(20)
文字类型学新说·····	(40)
汉字性质和文字类型·····	(50)
汉语的内在规律和汉字的内在规律·····	(54)
汉语内在规律和中文输入技术·····	(63)
《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	(68)
汉语拼音三原则·····	(79)
《汉语拼音方案》和国际标准·····	(84)
中文罗马字母拼写法的国际标准化·····	(91)
回忆《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过程·····	(96)
汉语拼音正词法问题·····	(102)
汉语拼音正词法的性质·····	(112)
现代汉字学发凡·····	(123)
现代汉字中的多音字问题·····	(131)
汉字效用递减率·····	(139)
现代汉字中的声旁表音功能问题·····	(140)
世界文字的鸟瞰·····	(148)
谈谈比较文字学·····	(163)
文字学的轮廓画·····	(172)
字母学略说·····	(180)
六书有普遍适用性例略·····	(190)
三种古典文字简介·····	(193)

语言生活的历史进程

人类形成的时候语言就开始萌芽了。人类成为万物之灵的主要条件是发展了语言。语言扩大了大脑对信息的记忆量，便利把信息提炼成为知识，利用知识支配环境。语言是最基本的信息承载体。文字、传声技术和计算机提高了语言的传播功能；国家共同语和国际共同语扩大了语言的流通范围。

一、文字的发明

一万年年前开始了农业化，采集改进为耕种，狩猎改进为畜牧，个体觅食改进为集体生产，流散栖息改进为屋宇定居。于是，物质生活之外发展了文化生活。

农业化的一万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五千年是口语生活时期，只有听觉信号的语言，没有视觉信号的文字，这是“单信号”时期。后一阶段的五千年创造和传播了文字，进入听觉和视觉并用的“双信号”时期。

许多民族创造过原始文字。只有极少几种文字达到能够完备地按照语词次序记录语言的成熟水平。最早达到成熟水平的文字是五千五百年前西亚两河流域的丁头字和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圣书字。在东亚，文字的成熟比西亚和北非晚两千年。三千三百年前中国的甲骨文是已经释读的最早汉字。在美洲，文字的创造更晚，中美洲尤卡坦半岛的马亚文从创始到今天不到两千年。

跟甲骨文相同的时代，地中海东岸从表意兼表音的文字中发展出纯表音的字母。字母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经过了两千年的孕育发展然后诞生的。比拨罗字母是已经释读的最早字母，它向四方传播，经过不断变化，成为今天全世界的各种字母文字。

文字使眼睛帮助耳朵，把难于传久和行远的声音，变成可以留给后世和送到异地的符号，打破了语言的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只有母子传授的口语教育时代过去了。师生传授的文字教育时代开始了。造纸术和印

刷术使文字记录大量增加。图书馆出现了。图书馆扩大了人类大脑的记忆容量，把大脑储存不下的大量知识储存到千千万万本书籍中去。从此，人类多了一种学习和应用文字的脑力劳动。

文字把模糊的传说写成明确的历史。有历史记录的社会被称为文明社会。文字和文明几乎成了同义语。今天世界上已经没有不用文字的国家，但是还有数以万计的文盲，他们落后于历史五千年。

二、国家共同语的形成

开始于三百年前的工业化，使人类的语言生活发生急剧的变化。工业化时期的语言生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两百年，主要特点是确立和普及国家共同语。第二阶段一百年，主要特点是发明、发展和推广传声技术。

工业化需要全民义务教育。全民义务教育需要全国共同语。普及共同语成为工业化国家的基础政策。

农业化时期就有文字教育，但是全民义务教育是工业化的产物。农业化时期就有共同语，但是共同语普及到全国人民是工业化的产物。

共同语有范围大小的不同，有民族共同语，有全国共同语（国语），有区域性的国际共同语，有世界性的国际共同语。工业化国家需要普及全国共同语，作为全民义务教育的教学媒介和社会活动的交际工具。

在农业化时期，农民安土重迁，共同语用处不大。当时的农业知识比较简单，可以口头传授，不一定用文字。需要文字和共同语的主要是官吏和商人。到了工业化时期，生产知识复杂了，口头传授不够了。人民需要文字，需要学习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工人和商人大量增加，他们流动频繁，不受乡土限制。于是，实行全民义务教育，首先普及“读书、写字和算术”的基础知识。读书和写字在拼音文字国家里就是学习共同语。儿童进学校，第一件事是接受正音教育。官吏的语言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做官要竞选演讲，演讲要说共同语，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口头讲给人民听。普及口头共同语和书面共同语成为全国上下的头等大事。

全国共同语主要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在多民族国家中，以主体民族的共同语作为全国共同语。另一种是由殖民地独立而成的国家，以原先宗主国的语言作为全国共同语。

在欧洲，跟中国汉朝大致同时代的罗马帝国，实行以拉丁文统治多

民族大帝国的“书同文”政策。掌握拉丁文的主要有官吏和军人。广袤的国土是一片文盲的荒原。经过中世纪黑暗时期以后，各民族独立成为国家。文艺复兴解放了思想，废除“文言”拉丁文，提倡各民族的共同语和语体文。这样就准备好了工业化的语文土壤。

共同语需要有语音标准。语音标准是否确定是共同语“成年”的标志。共同语是否普及，首先在全国学校成为校园语言，是教育“成年”的标志。西欧在三百年前达到了这两个“成年”的标志。日本在一百年前达到了这两个“成年”的标志。凡是认真工业化的国家都以普及共同语作为建国大事。

中国在1912年废除帝制以后，特别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以后，开始初步的工业化，提出了全民义务教育和全国共同语（国语）的要求。1982年的宪法规定“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和“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汉语方言复杂，推广普通话并不废除方言。方言是主要从母亲那里学来的“母亲语”；共同语是主要从教师那里学来的“教师语”。原来只说方言，这是“单语言”生活；现在要说方言和共同语，这是“双语言”生活。从“单语言”到“双语言”是语言生活的重要发展。

日本在明治维新（1868年）以后只用二十年时间就普及了国语。日本能够迅速普及国语，依靠两项措施。一项是重视小学教育，小学以国语为教学语言。另一项是利用“假名”字母，夹在汉字中间，注在汉字旁边。日本的法律和公文现在只用1945个常用汉字。由于用字减少，假名旁注只在难字上应用了。假名字母是日本普及国语和义务教育的钥匙。日本的正式文字在一千年以前只写汉字，是“单文字”生活；后来既写汉字，又写假名字母，变为“双文字”生活。

在中国，“五四”运动废文言，兴白话。白话文就是“用汉字书写的规范化国语”。汉字是“超方言”的，同样的文章各地读成不同的方音。“用汉字书写的国语”是否也读成各地的方音呢？不行！读成方音还成什么“国语”？于是要求“读音统一”。读音统一就要给汉字注音。

1918年公布的“注音字母”可以看作是中国的假名，比日本创造假名晚了一千年。注音字母使中国人从只用汉字的“单文字”生活，变为又用注音字母的“双文字”生活。1928年公布的“国语罗马字”和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把民族形式的注音字母改为国际形式的罗马

字母，便于跟世界各国作文化交流。

二千二百年前秦始皇实行“书同文”政策，当时只可能实行“书同文”，不可能实行“语同音”。二千二百年后的今天，如果只有“书同文”，就不合时代要求了，必须进一步实行“语同音”。

三、传声技术的发明

1876年贝尔发明电话。1877年爱迪生发明留声机。从此，人类的语言生活进入传声技术时代。后来发展成为广播、电视、录音、录像、微波电话、卫星传播等等，使语言的声音可以直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一定依靠文字。

文字把听觉信号转变为视觉信号，依靠信息承载体的改变打破时空限制。承载体的改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传声技术不改变信息承载体，直接把语言的声音送到远处，留到未来。使用传声设备几乎不需要什么学习。

半个世纪以前，好些国家普及了电话，进入电话社会。现在进入电话社会的国家越来越多了。所谓电话社会就是除办公室用电话以外，每个家庭也至少有一个电话。电话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必需品。电话能扩大人的活动范围，提高人的工作效率。有了电话，不识字的人也能跟远方通口信。写信麻烦，寄信太慢，打电话方便，可以立刻得到回音。电话代替了很大一部分信件。办理公事先用电话谈妥，书信只作后补的记录。电话会议节省了人们的开会奔波。微波电话可以通到外太空的地球卫星、海底的潜水艇、高速飞驰中的汽车和飞机。唱片把音乐送到家庭。录音带和录音盘把无声的书本变成有声的书本。有声图书不仅健全人可以“听读”，盲人也可以“听读”。既有文字图书，又有语音图书，图书从“单信号”变为“双信号”。

传声技术促进了共同语的普及和文体的口语化。广播和电视使广大群众在娱乐中学到共同语。广播文稿必须把其中读出来听不懂的文言改为大家听得懂的白话，否则广播就失去作用。小说的初稿不必用笔写了，可以用口语说给录音带和录音盘，然后依照录音打成文字，加以修正。听不懂的小说只能有文字版本，听得懂的小说还能有语音版本。小说原来是“说”的，后来变成“写”的，现在又变成“说”的了。新闻记者用电话传送新闻，一方面刊登在报纸上，一方面在电台广播，这样的新闻不可能用文言。保守性最强的《圣经》也翻译成现代文体了，由广播员

朗读，录音后在教堂和电台广播，加强传教效果。时代跟文言文告别了。

传声技术不但能代替文字，还能做各种文字不能做的工作。传声技术和文字同时并用，大大扩展了语言生活。

四、语文技术的信息化

二次大战以后，历史进入“新技术”时代。新技术革命来势迅猛，它对人类的语言生活发射出强烈的冲击波。新技术时代的语言生活有两件突出的事情。一件是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另一件是国际共同语的发展。

计算机的语词处理智能化使语言生活发生多方面的革命。

文书工作革命了，包括印刷革命和通信革命。“文房四宝”成为古董了。文书、档案、编辑、出版、邮递、电报，这一切工作的方法和程序彻底改变了。

图书馆革命了。图书馆可以看作是人类的第二个脑袋。计算机可以看作是人类的第三个脑袋。图书馆是“纸脑”，计算机是“电脑”。二次大战后，出版物急剧增加。全世界一年出版的图书，等于中国过去三千年出版的图书。浩如烟海的图书，要求缩小储藏和快速检索。电磁和激光的记录代替缩微胶片，庞大的书库变成小小的“光盘”。电脑检索代替卡片目录，“大海捞针”一捞就得，还可以在万里以外遥控检索。情报的电脑化节省了全世界学术研究者三分之一的时间。

翻译革命了。计算机使人工翻译向机器翻译发展。已经实现的“机助”翻译，初稿用机器翻译，再由人来加工，可以节省人力十分之八。计算机可以把一种文字翻译成另一种文字，还可以把一种口语翻译成另一种口语。电话和机器翻译结合，一地讲的是“外”国话，另一地听到的是“本”国话，这样的国际翻译电话，在不太遥远的明天将成为事实。

教学方法革命了。计算机创造出各个学科的新式教学法，帮助教师辅导学生，回答学生随时提出的问题，改正学生的作业。计算机和电视结合，使教学活动跳出了学校的围墙，把课堂搬到每一个家庭中去。教学革命使科技知识大众化。车站、机场、各种公共场所，都能有“人机问答”，24小时不停地为顾客服务。

语词处理技术已经解决了中文在计算机上输入输出的难题。只要输入汉语拼音，以语词和词组等为单位，计算机就能自动变换成为汉字输出，不用任何字形编码，这使中文语词处理机接近于英文。